

读/书/笔/记

在这本书里
童年的小镇又复活了

不知道别的小镇长大的孩子会不会和我一样，心里总有一个田园梦，这个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挥之不去。

其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镇，和乡间并没有大严格的区别，因为经常出街一两百米，就是葱茏的庄稼地。所以，小镇长大的孩子其实是幸运的，乡下孩子玩过的，我们都玩过，而乡下孩子很少吃到的包子馒头抄手，我们却时时吃。所以，我以及我很多在小镇长大的朋友，一提起那泛着光的青石板老街，那夕阳下河边热闹的人群，以及老街拐角那家面馆……无不带着一层黄昏时的霞光，既温馨，又怅惘。

为什么怅惘？因为记忆中的小镇全都消失了。前些年春节特意回了趟老家，天，如果不是名字还是那个名字，我死都不敢相信这就是我曾经住了十几年的小镇。以前要爬一段长长的缓坡才走得到老街，现在哪里还有什么坡，已全部夷为了平地；以前镇上虽然没有河，但正街两边的房子，全是木质的吊脚楼，上面住人，楼板下面就是菜地，每到冬天，那一排排绿得发亮的卷心菜，成了萧瑟中唯一的亮色；正街右拐，是个粮站，而粮站背后，是块菜地，记忆中夏天总种着黄瓜，我和小伙伴们经常趁大人午睡时跑到地里摘黄瓜吃……但，这一切全都没有了，有的，是又一栋又一栋长相一致的三层小楼，清一色的卷帘门、瓷砖墙和花花绿绿的化纤窗帘，看得我都听到了心碎的声音。

所以，当看到作家、媒体人袁曙光这本《日子疯长》时，我简直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欣喜——妈呀，我记忆中的小镇，又复活了！

“小镇由西向东一条独街，长两三里，居二三百户人家。两厢房屋相向而构，中间夹一条青石街。石板已被踩光磨平，下雨天看得见行人的身影。街道虽不长，却也分了好些街市。居民的营生，大多相类而聚。无论住在哪段街上，居民大体各干各的，并不因眼红他人而改换行当，即使是祖上传下的生意与人重了，亦不会刻意地压价竞争，谁家是谁家的熟客，彼此都守个界限。街市上就这一些居民，只养得活这些商家，大家因个安安稳稳过日子，并无发财致富的梦想。除却年节，平素的生意不兴隆亦不清淡，一日一日长流水的样子。”

“黄昏时，码头是孩子的天堂。放学未及回家，书包衣裤往码头上一扔，便一头扎进清澈的河水里，比谁的猛子扎得远，比谁的仰泳时间长，比谁的狗爬速度快。若不是家长责骂呼唤，没有记得回家吃饭。”这个场景，我同样是小镇少年出身的先生应该更有发言权，他小时候因为到离街几百米的河里洗澡，数次被母亲用竹片打。

还有小镇上的油坊。“一年四季，油坊里热气腾腾，即使是数九寒天，榨油佬也只穿一条油渍渍的短裤。榨油的木槌高悬在屋梁上，榨油时须两个壮汉将榨槌合力往后推，直到高过头顶，然后松手闪人，木槌重重地撞在榨床上，榨床上的油饼，便汩汩地渗出油来。新榨的油香，从榨房飘出去，风一吹，满镇都浸在油香里。”

“码头对岸的桑园，区划不属小镇，但对小镇的孩童与少年，却是割舍不去的一片乐土。因了这片桑园，镇上差不多每个孩子的书包里，都会藏着一个盒子，里面装着蚕宝宝和嫩嫩的桑叶。课堂上无论老师多严苛，学生都会偷偷地打开盒子，看蚕宝宝吃没吃桑叶，有没有拉稀。课间则各自捧出盒子攀比，谁的蚕宝宝多，谁的蚕宝宝大。”

“桑园藏着的另一份惦记，是蜜甜的桑椹。初夏时节，翠绿肥大的桑叶里，星星点点的桑椹结出来，由青而红，由红而紫。骑在粗壮的枝杈上，一边采叶一边吃桑椹，浓稠的汁液染紫了嘴唇，也染紫了双手和脸颊。”

看看，是不是和我们小时候的小镇生活一模一样？是不是每一段都想抄下来，刻进心里，刻进梦里，细细咀嚼，时时怀念？（夏周）

1994年10月13日，日本东京世谷城区，大江健三郎的家门口已经站满了媒体记者。这不是第一年如此了，此前两三年尤其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当晚，媒体人士就会聚集到可能获奖的日本作家门口，大江健三郎家只是其中之一。

当时大江健三郎的次子和女儿都还没有结婚，全家五口都在家里。晚饭过后大江健三郎在看书，其他人各自做各自的事。一个电话打了进来，致电者是多年前大江健三郎在瑞典哥德堡市演讲时认识的大学教授斯特列·阿连。但在阿连通知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时，他并不知道阿连也兼任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终身秘书。

表示完感谢挂上电话之后，大江健三郎对围观的家人们说：

“获奖了。”家人们静静地点了点头，回到各自的房间去，留下大江健三郎一个人在起居室里，奇怪为什么好像没什么反应。

半个小时之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大江健三郎也走出家门，被三四十名记者的闪光灯淹没，表示“日本文学的水平很高，得益于日本现代作家们的积累，还活着的我才获得了这个奖项……”虽然谦虚，但自从1968年川端康成首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日本已经又等待了26年。一直等待的滋味，如今的村上春树想必感受充分。

其实这一年，59岁的大江健三郎正准备改变，“我感到如此下去将难以实现大的跨越，依靠这一点一点写出的小说连接起来的人生似乎是懈怠的人生”。与妻子由加里商量了一下，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生活水准还能维持三年左右，因此大江健三郎考虑今后去国外某个大学里教书，同时重新审视自己的作

品和生活，朋友们也平静地接受了他渐渐远离小说创作的倾向。然而一个月后，大江健三郎就获得了诺奖。

诺奖奖金折合下来为一亿日元，大江健三郎买下了此前“想都不敢想”的所有书，再大修了别墅，此外似乎也没干什么，这笔钱就在十年间消失了。获奖对于大江健三郎而言，“既没有因此遭遇麻烦，也没有因此而自由”。

即便如此，他却向瑞典力荐他欣赏的中国作家莫言。他邀请莫言赴日演讲，也去莫言的高密老家看红高粱，更把莫言介绍给诺奖的翻译委员会。他在2002年预言莫言十年内就能拿到诺奖，等到2012年莫言真的拿奖，有媒体想就此与大江健三郎做个“深度对话”，却被他拒绝了。

莫言说：“我一直把他当老师看待。”

大江健三郎： 如林中泉涌的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三个孩子的父亲、反战反核人士、音乐迷……

大江健三郎一生有很多标签，但最契合的，还是小说家。从二十出头写第一篇小说开始，他连续不断地创作了半个世纪：先是短篇，后来长篇。

此次他去世十天后，全世界才知道这一消息。迟来的告别，也像是典型的小说结尾。

除了在国外讲学或访问，大江健三郎的一天通常这样度过：清晨六七点起床，然后工作到下午两点左右，早饭中饭在此期间合在一起吃。跟着处理完信函和邮件之后就开开始读书，大江健三郎没有秘书，一切与外界的沟通都是亲力亲为。傍晚七到八点与长子大江光一起吃晚饭，然后继续读书或工作。十点到十一点之间小酌一杯，跟着在光起床上厕所并回到床上后为其盖好被子，之后自己才上床入眠。除了偶而有客来访之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大江健三郎28岁那年，长子大江光出生，但大江光头部长了个很大的瘤子，除了必须立即手术外，医生说不知道手术能不能延续婴儿的生命——即便能延续也会留下残疾，甚至会成为植物人。

于是在光出生的第一天，大江健三郎就开始每天先去光住的医院探望孩子，再去妻子住的医院探望妻子。虽然光总算活下来了，但智商长期停留在四五岁的状态，也离不开人照顾。

光每天晚上不论几点睡，都会在零点过起床上厕所。夏天倒没什么问题，冬天他回床上却不能很好地用毛毯把自己裹好保暖。于是大江健三郎每晚一直工作到深夜，等到光上完厕所，帮他裹好之后自己再休息。年轻的时候，大江健三郎脑中常常闪过一个念头：这就是我的“永远”吗？

然而四十多年就这样过来了。比给长子盖被子更长久的，可能只有写小说这件事了。大江健三郎在20岁左右开始写第一篇小说，当时只是为了娱乐好友伊丹十三，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娶他的妹妹由佳里为妻。在大三开始写论文时，他意识到自己不是



1967年时的大江健三郎。他后来把方框眼镜换成了圆框，因为后者才是作家的标配

做学问的料，于是撤回报考研究生的申请，立志成为小说家，从此开始写起小说来。这一年，大江健三郎23岁。一开始是短篇，后来是长篇。

即便在照顾病患的长子时，大江健三郎也没有停笔。1964年8月，他出版了《个人的体验》，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随着残疾婴儿的出生，身为父亲的“鸟”陷入了道德困境。梦想去非洲展开探险之旅的他，深怕

自己就此被这婴儿拴住，可又不敢亲手了结他的生命，于是选择了逃避。鸟将新生儿弃置于医院，一心盼望他衰弱而死，自己则钻入旧情人火见子的温柔乡，用性与酒麻痹自己——他如何去寻找救赎？

现实中的大江健三郎找到了救赎之路。此后，他更开始关注广岛核爆的受害者，由此成为坚定的反战与反核人士。多年后，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特别提及了《个人的体验》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两部作品的重要意义。

声名鹊起后在写，中后期一度没有多少读者的情况下也在写，总之就是坚持写、一直写、不断写，直到写作时间积累到了半个世纪。虽然大江健三郎一度后悔“过早开始了小说家的人生”，但五十年写下来，除了自己内发性的决定外，从不曾因为其他原因改变文学的方向，于是终于能对自己说：“你干得可真不错啊。”

即便笔耕不辍，但比起写作，大江健三郎或许更重视阅读。某次受访时被问“如果您的孙子告诉您也想成为小说家，您将如何表态？”大江健三郎回答：“请求他不要成为小说家，而成为优秀的阅读者，这也是为了他能够更宽广、更长远地选择自己的人生。”

在东京大学文学系的四年里，大江健三郎自承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培养了以英语、法语及日本古典语言阅读的能力。他的创作源源不绝，来自于他的超量阅读。26岁时他曾去巴黎旅行，旅居法国。比他大五岁的日本作家开高健怂恿他：“不去买书？”

大江健三郎回答：“与其做那种事，读书该多好呀。”

典型的书生气。但若是没有这种书生气，恐怕也很难一写就是五十年不停。

大江健三郎身上的文学气质，部分来自于遗传。1934年春，热爱中国现代文学的日本女文青小石同丈夫大江好太郎一起，自上海北上前往北大聆听胡适演讲，并在王府井的旅店里与店主聊起了大江好太郎非常喜欢的《孔乙己》。大江健三郎，就孕育于此次中国之行的旅途中。

大江好太郎的家在日本四国岛的爱媛县大濑村，周围都是森林，一家人以生产印制纸币所需的植物纤维原材料为生。1944年，9岁的大江健三郎在家里的火炉边，听父亲谈起了鲁迅、中国之行以及在王府井的旅店里学会了“茴”的四种写法。多年以后小石才告诉大江健三郎，父亲回房睡觉时很看好他，“以前认为老大老二有出息，现在想来是看错了，以后健三郎肯定会有大出息。我讲到鲁迅的时候，健三郎眼睛都是直的，都放出来，这孩子对学习抱有强烈的欲望，将来不会是普通人……”

那是父亲最后留给大江健三郎的印象，因

为突发心脏病，那晚躺下后父亲就再没起来。

除了家学外，森林更是影响大江健三郎一生的关键。很小的时候，大江健三郎曾经在半夜一人独自走进森林，结果被大雨困在了树洞里，直到消防队员把他救出来。幽暗的森林雨夜，独处的孩子，如同后来宫崎骏动画《龙猫》中的场景，后来都被大江健三郎写进了小说。

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聪明的雨树》《M/T与森林中的奇异故事》到长篇三部曲《燃烧的绿树》，森林始终是大江健三郎小说里挥之不去的元素。法国作家和批评家菲利普·弗雷斯特表示：“大江作品中的乡愁是前往未来的动力，而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乡愁之场所就是森林。”

从乡村学童到日本东京大学的高材生，从立志成为小说家到与昆德拉、马尔克斯交往，大江健三郎的一生简单而传奇。他深受法国存在主义的影响，小说主题往往并非明确的历史事件，最终却得到如下的评论：日

本二战后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都在大江健三郎的小说里。大江健三郎用语言构筑的意象森林，与他从童年时代每天身处其中的森林，两者在小说中经过长年累月的融汇后交织为一体。

在不自觉的过程中，大江健三郎在东京写下了与故乡的连接。他的导师渡边一夫曾经评论他，“大江君不愧是在森林里长大的，他写小说就像林子里的泉水似的，当你怀疑是否已经枯竭的时候，他又接着写了下去，就像新的泉水重新涌出来了似的。”

大濑村向来有一个传说：人一旦死去，其灵魂会转着圆圈飞向山上的森林，停留在属于自己的那棵树的根部。经过若干年之后，灵魂再从那里飞下山，进入另一个新生婴儿的心胸……大江健三郎没有在自己的故乡去世，但东京的某一棵树下，如今未必没有住着逝去的大江健三郎。有朝一日，如森林中泉涌的灵感，或者又将重现于世。

文/启凌 图/视觉中国